

文学翻译与上海形象

——基于自塑与他塑的互动研究

董琇 郭嫣然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092)

摘要:中国海外形象的建构依赖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受自塑与他塑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文学作品是重要载体。英译中国文学与英语文学中的上海形象在自塑与他塑之间存在一定偏差。首先,在译介的叙事呈现层面,中国文学在对外传播中对城市温度与厚度的表现仍有所欠缺,如反映上海的包容力以及抗逆力等深层文化品格的叙事尚需通过选材与阐释加以凸显;其次,在翻译策略层面,作品与西方文化具有较深渊源的符号和事件,有待通过“务实”策略加以挖掘并有效传递。基于他塑的反馈,可在回塑过程中强化上述两个维度,提升上海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精准度,完善中国叙事体系,向世界展示多元立体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上海形象;文学译介;自塑;他塑;回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5-0105-12

0 引言

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内外部公众总的评价和认定(管文虎,2000:23),其中城市形象是国家形象的构成部分与具体体现。在许多国外受众眼中,上海就是中国的缩影和象征(陈超南等,2008:4)。1843年开埠后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和最具异国情调的繁华都市,其特殊性使中外作家对上海的想象与怀旧风靡一时,因此涌现了大量关于这座城市的书写。外译的中国文学与原创的外国文学作品通过自塑和他塑的双重路径,共同塑造了海外的上海形象。

在翻译领域,有学者主要探讨了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在塑造上海形象中的作用及其跨文化影响(凤羽等,2022;叶梓,2022;念蕾,2023),但研究范围有待拓宽,目前主要针对某一具体作品进行个案研究,无法全面覆盖翻译中的上海形象。关于英语文学中的上海形

收稿日期:2025-0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都市题材小说英译与国家形象构建的实证研究”(19YJA74001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董琇,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译者风格、文学翻译与文化翻译研究。

郭嫣然,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外译研究。

引用格式:董琇,郭嫣然.文学翻译与上海形象——基于自塑与他塑的互动研究[J].外国语文,2025(5):105-117.

象,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19至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一特定历史阶段。这些文学创作更倾向于揭露城市堕落和野蛮的一面(陈晓兰,2005;冯雪静,2007;梁昕照,2010;于蕾,2011),这种表现方式映射了西方视角下对该城市固有的认知模式。尽管以上研究为理解上海形象提供了重要洞见,但相关讨论仍需进一步丰富,并有待将自塑与他塑形象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对比研究,进而促进形象研究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由此,本文以形象建构为核心议题,结合相关翻译思想,首先探究自塑与他塑两种路径如何通过翻译实践与文学创作来塑造上海形象,在辨析二者差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并汲取英语文学中能够丰盈上海形象的文化资源与表达策略。最终,本文提出回塑的方法,即把外部视角融入自我形象的构建,以回应我们对外翻译中的文化错位问题,增强自塑在中国海外形象建构中的影响力,从而更有效地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

1 英译文学中的上海形象自塑:繁华现代与市井日常

翻译是对外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目前,以上海为载体的文学作品英译已初具规模,既得益于国家机构主导的“熊猫丛书”及其他翻译工程和项目,也离不开国外出版机构的推动与参与。两者相辅相成,使上海形象得以在异质文化空间中被不断建构与延续。下面将根据作品的创作时期对英译文学中上海的形塑作一梳理。

20世纪初至30年代,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主要展现了上海作为现代商业文明中心繁华喧嚣的都市生活。程小青、郁达夫、施蛰存、穆时英、茅盾、丁玲等多位作家的作品在译介之列。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Shanghai Fox-trot*, 2014)、《夜总会里的五个人》(*Five in a Nightclub*, 2014)等作品将上海置于歌舞厅、夜总会、跑马场、豪华别墅等场所,半殖民地时期的上海充斥着奢靡刺激、新奇怪异等种种参差不齐的景象,但这种令人目眩的都市魅力背后常伴有颓废与矛盾的色彩。穆时英笔下的上海“于穷人而言是炼狱,于富人是梦幻的游乐场——一个充满了短暂而难以捉摸的快乐幻境,然而股市崩盘、赤贫、内乱和一触即发的大战等种种现实紧随其后”(Field, 2014: xxiv)。左翼文学代表人物茅盾的《子夜》(*Midnight*, 1979)力透纸背地勾勒出十里洋场的奢华,同时“以戏剧化的方式展现出中国从乡村到城市所经历快速变迁与断裂感,以及现代中国历史全速推进的进程”(Ng, 2020)。在丁玲的《1930年春上海》(*Shanghai, Spring*, 1930, 1989)中,上海同样以繁华之地的形象出场,其高度活跃的金融市场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资本和人才涌入,同时该城市也被描绘成“政治言论、左翼组织和革命热情激烈涌动的场域”(Stevens, 2003)。

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作品多集中描绘上海的日常生活。张爱玲的作品在英语世界获得了较多的讨论和关注,由纽约书评出版社(New York Review Books)出版的张爱玲作品集《倾城之恋》(*Love in a Fallen City*, 2006)共收录了六部作品,它们“将历史现实(战

争、动荡、封锁、饥饿、死亡和资源匮乏)与家庭生活和私人情感领域(爱情、失落、幻想、情感渴望和艺术创造力)结合在一起”(Huang, 2009: 193), 隐藏在五光十色表象之下悲喜交加的生活正是张爱玲对上海内在特质挖掘的着力点。90年代的作品大多交织着上海过去的辉煌, 通过重新表述和创造过去的元素, 以真实或半真实的方式绘制了上海的文化地图, 试图唤醒和重温逐渐褪色的老上海记忆, 这既是对消逝历史的感伤与向往, 也是对过去的一种反思与传承。译介的相关作品包括程乃珊的《蓝屋》(*The Blue House*, 1989)、《金融家》(*The Banker*, 1993), 王安忆的《富萍》(*Fu Ping*, 1989)、《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2008), 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Shanghai Princess: Her Survival with Pride Dignity*, 2010)等。这些作家笔下的上海虽然不乏灯火辉煌与物质欲望交织的景致, 但主要关注对象是中产阶级和普罗大众, 将弄堂、咖啡馆、石库门、洋房等作为怀旧空间, 徜徉在上海历史遗迹中的同时, 也恢复了城市的人间烟火气。其中, 王安忆的书写将上海生活的华丽表象一一解构, 褪去其浪漫色彩, 颠覆了固有的城市刻板印象, 从而为普通上海人和当代社会构建出一个更为真实的上海图景(Bernstein, 2020: 86-87)。总的来说, 以上作品为英语读者探寻、理解现代中国的种种迹象提供了重要视角, 也丰富了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认知维度。

关于新世纪以来的上海题材文学, 国外积极进行了翻译与推介。马里昂·博雅斯出版社(Marion Boyars)出版了虹影的《上海王》(*The Concubine of Shanghai*, 2008), 而英国逗号出版社(Comma Press)推出“阅读城市”系列丛书, 目前已出版了包括利物浦、东京、威尼斯在内的30多部城市小说。其中, 《上海故事》(*The Book of Shanghai*, 2020)是一部短篇小说集, 收录了10篇有关上海的作品, 如蔡骏的《苏州河》(*Suzhou River*)、滕肖澜《星空下跳舞的女人》(*Woman Dancing under the Stars*)等。值得关注的是, 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的小白的《租界》(*French Concession*, 2011)是在众多以上海为载体的小说中为数不多的跨文化题材作品。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曾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拥有共同的记忆场所, 这赋予了作者超越单一中国文化视角的可能, 为城市文化品格灌注了更多意义。

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 受意识形态、主流文学观念、民族立场、文化利益等诸多因素影响, 翻译呈现的形象或再现或扭曲。相对而言, 上海文学英译中所塑造的形象虽不一定与源文本完全等同, 但其内核整体上未割裂或脱离, 源文本的记忆始终嵌入在翻译之中。整体来看, 这些作品“在译文效果上反映为译文向原文靠近的求真度, 在译者行为上反映为译者在翻译内向原文靠近的求真努力”(周领顺, 2014: 163)。《倾城之恋》译者金凯筠“戏称自己是个‘句法奴隶’(Slave to Syntax), 总是绞尽脑汁想去复制中文的措辞方式”(覃江华, 2011)。由白睿文和陈毓贤翻译的《长恨歌》“坚持还原原文特质, 甚至连汉语中的‘拆字’也尽最大努

力再现之”(朱振武,2020)。此外,“熊猫丛书”的翻译也严格践行忠实的原则(耿强,2009),由该丛书英译出版的《1930年春上海》《蓝屋》同样相对准确地移植了原著中的语言和思想。鉴于英译本的转换与阐释基本上遵循了源语的话语信息,因此中国文学的本体形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异域中传播的上海形象。

总之,半个多世纪来的外译努力使上海的过去得以再生和流传,以上作品触及了这座城市光怪陆离、驳杂斑斓的诸面,填补和丰富了英语世界的中国形象并促成了广泛的文化对话。然而,观察发现,这些译介作品的选材比较集中,“一旦以文本形式进行编码,局部形象即可代表整体”(Beller,2007:5),这种倾向影响了国外读者对真实城市的全面认知,因此有待提升译介作品中上海城市风貌的多元性与鲜活性。

2 上海形象的他塑:海纳百川与抗逆力

“只有以‘他者’为‘镜’观照‘自我’,才能凸显形象研究的总体性。”(李圣杰,2023)关注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他者与自我关系的理解,也为当前的文化输出提供了具体的参考实例与改进思路。以英语书写中国的文学作品涉及对中国习俗、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等复杂议题的探讨与表达,这一活动可以视为一种“无本译写”。与传统翻译相比,“‘无本译写’不是以某单个原文为底本的‘译写’,其‘底本’是没有确定范围的,可能是多本对单本的关系、碎片式文本对单本的关系,或者是多模态文本(以及经过心智加工的)合成式文本对单本的关系。”(刘晓峰,2023)虽然“无本译写”与传统翻译在形式与方法上存在某些差异,但形象建构是共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跨文化文本无论是否依托原文,都参与异域形象的塑造,本质上体现为“译”与“写”的互动。“‘译’和‘写’既有可能是一体两面关系,又有可能是交融关系,更有可能是两者之间的互释互构、互相拓展发挥的渐变连续体关系”(刘晓峰,2023)。鉴于二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为便于讨论,将从创作内容与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展开。

2.1 英语世界的形象表征

一直以来,英语文学未曾停止过对上海的表征,特别是对老上海的追忆与缅怀,体现出一种持久的文化兴趣,这种书写倾向与英译文学的记叙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呼应与重合。老上海所蕴含的浪漫与神秘为西方历史小说提供了理想的背景,而上海本身作为一个强大的记忆场,也构成了跨文化叙述的重要部分。

2.1.1 叙事构建与文化传达

以下是5部2000年以来与上海题材相关且在Amazon和Goodreads网站上评论总数各自在100条以上的英语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将虚构与非虚构、主观性与客观性融为一体,

在众多元素中进行选择性的编码与重组,展现出鲜明的目的性与策略性,旨在回应英语世界的现实需求与文化期待。

表 1 5 部英语文学作品

书名	作者	出版年	出版社
<i>The Distant Land of My Father</i>	Bo Caldwell	2001	Chronicle Books
<i>Night in Shanghai</i>	Nicole Mones	2014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i>Shanghai Grand: Forbidden Love and International Intrigue in a Doomed World</i>	Taras Grescoe	2016	St. Martin's Press
<i>Shanghai Story: A WWII Drama Trilogy Book One</i>	Alexa Kang	2018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i>The Last Rose of Shanghai: A Novel</i>	Weina Dai Randel	2021	Lake Union Publishing

杨惠中(2002:177-179)认为关键词表是确定语篇主题、词语之间的关系以及情节推进的有效方式。关键词也称为主题词,是指与参照库相比,出现异常频繁的词汇(Scott et al., 2006:55)。本文使用 AntConc 软件进行关键词检索,选取第一部分所提及的 5 部英译作品作为参照语料(*Midnight, Love in a Fallen City, The Concubine of Shanghai,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French Concession*),并制作英语文学的关键词表,选取显著性排序靠前的前 30 个名词作为分析对象(排除人名这一干扰项),从而确定英语文学中高度关注的话题。

表 2 5 部英语文学作品主题词表

序号	关键值	关键词	序号	关键值	关键词
1	1 111.974	father	16	232.465	club
2	875.662	Japanese	17	230.262	British
3	690.846	China	18	228.110	Japan
4	655.965	Chinese	19	222.408	family
5	610.814	American	20	206.963	clothe
6	511.985	eye	21	201.843	week
7	382.798	Shanghai	22	176.071	arm
8	374.015	year	23	175.121	grandmother
9	326.859	Cathay	24	167.341	piano
10	314.124	soldier	25	162.215	letter
11	309.815	mother	26	150.263	war
12	294.583	parent	27	150.059	month
13	253.449	nationalist	28	146.268	Bund
14	251.397	refugee	29	146.160	hotel
15	241.532	foreigner	30	144.228	city

以上主题词的语义类型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类:各个群体(Chinese、American、refugee、

foreigner、British)、战争(Japanese、soldier、Japan、war)、亲情(father、mother、parent、grandmother)、时间(year、week、month)以及建筑(Cathay、hotel、Bund)。

首先,英语文学中外国人出现的频率较高,如“American”“British”“foreigner”等,较为注重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互动和紧张关系。意识形态、权力和道德观等支配了城市形象的筛选,作家往往关注的是与自我形象和群体利益相关的部分,目的是服务、维护和保存民族身份和文化。老上海以其海纳百川的精神,成为当时全球最具多样性的城市之一,如作品中谈到,“上海约有八千名英国人、两千名美国人和数千名俄国人及其他欧洲人,而如今这座城市又涌入了成千上万的难民”(Randel,2021:28)。彼时的上海“容纳了多达15万的来自58个国家的外国人”(钟浴曦,2013),这里既是外国人经商的理想之地,也是许多因战争等原因而流离失所者的避风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既采取俯视视角描述外国人来到上海后对这座城市的心理动向,如“眼前的街景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地方都更显破旧”(Caldwell,2001:226)。同时也会赋予上海乌托邦化的色彩,满足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心理,如“上海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Mones,2014:17)。这些象征性、模式化的套话在作品中反复使用,它们构成了上海形象的基本话语单元,承载着特定文化视角下对城市的想象投射与符号化塑造。总之,英语文学通过将外国人作为叙事主角重构了西方读者与上海的联结,从而使这个遥远陌生的异国城市向文化记忆载体转变,最终成为目标语文化内部共享的情感资源。

此外,英语文学倾向于通过建筑遗迹等景观符号如“Cathay”“Bund”来塑造上海形象。建筑是城市形象的重要年鉴以及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文学作品也需通过地点这个锚点和触发器来展开叙事。*The Distant Land of My Father* 这部作品以女儿安娜(Anna)的口吻讲述,“信上附有一张手绘的上海地图,我一一辨认着父亲标记的地方:我的办公室、百老汇大厦、外滩、圣依纳爵堂、虹桥——家”(Caldwell,2001:4)。这些地点是“承载家庭故事和社区记忆的容器”(Li,2010),凸显了上海在情感归属与记忆建构中的重要意义。现实存在的场所使城市形象更加可触可感,尤其与西方相关的建筑,使读者能够在空间体验中获得对历史与文化的代入感,同时瞥见中国建筑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接纳。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些建筑本身也因作品中角色的参与和内外力量的塑造被注入新的意义,其历史厚度由此不断叠加。

最后,通过战争冲突来提炼主题。“Japanese”“soldier”“Japan”“war”这一类词汇直指动荡局势下的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主要的全球冲突,相关题材在西方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彼时上海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中,这几部作品都或多或少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摹写和加工填补了这段记忆。例如,在小说 *The Last Rose of Shanghai* 中,来自上海的女老板邵艾颐(Aiyi Shao)和身无分文的德国难民恩斯特·赖斯曼

(Ernest Reismann)冲破种族禁忌而相爱,然而一夜之间仿佛永远不会终结的黄金时代随着上海被袭击、入侵、彻底沦陷戛然而止,倾泻的炸弹使所有人的命运瞬间逆转。同时,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中国人民面对战争时的坚韧和凝聚力,如“一些勇敢的中国人会携带武器,在屋顶或餐馆等地对日军进行反击(Randel, 2021: 322)“……上海没有让我失望。她拼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以二十五万的生命换来了敌人七万的伤亡,彻底击碎了敌人声称三天之内可以占领上海的狂言”(Mones, 2014: 179)等。这些英语文学展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图景,然而,相较于他者书写,中国本土这类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存在感却相对薄弱。“在二战题材经典文学的殿堂里,中国的抗战题材文学不仅缺席,甚至恐怕连对话的资格都尚不具备,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羞愧和遗憾。”(朱向前等, 2015)这种传播不佳的状况自然会导致中国人民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的苦难和牺牲不能被国际社会充分了解和重视,因此难以获得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2.1.2 翻译策略

从翻译策略来看,英译文学与英语文学同样存在差异。鉴于英语文学不以单一、固定的底本为依据,也较少受到忠实性标准的约束,译写时享有更高的自由度。其创作可汲取多样化的文化素材并进行整合重组,并在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发挥。下面将以“Cathay”这一关键词为例进行对比分析。

例1 原文:终于电车在华懋饭店门口那站头上停住了,当先下来一位年轻时髦女子,就像被那大风卷去了似的直扑过马路,跳上了华懋饭店门前的石阶级……(《子夜》)

译文: It finally came to a halt at the stop in front of the Cathay Hotel, and a fashionably-dressed young woman got off. She ran straight across road as if driven forward by the wind and flew up the stone steps in front of the hotel. (*Midnight*)

例2 The Cathay Hotel was Sir Victor's pied-a-terre in Shanghai; he lived in a luxuriously appointed penthouse apartment on the eleventh floor. It was here that Noel Coward wrote the play *Private Lives*, that Charlie Chaplin and Paulette Goddard dined at the hotel's Dragon Phoenix Restaurant, and that Douglas Fairbanks danced on the sprung teak floor of its eighth-floor ballroom. (*Shanghai Grand*)

(华懋饭店是维克多爵士在上海的居所,他住在十一楼的豪华顶层公寓中。诺埃尔·考沃德曾在这里创作了戏剧《私人生活》,查理·卓别林和宝莲·高黛在龙凤厅用餐,道格拉斯·范朋克在八楼舞厅柚木制成的弹簧地板上跳舞。)

例3 Since 1956, the Cathay Hotel has been officially known as Heping Fandian, which is Mandarin for “Peace Hotel”. (A name that came, prosaically enough, from the Asia and Pacific Rim Peace Conference held in Beijing four years earlier.) (*Shanghai Grand*)

(自1956年起,华懋饭店正式更名为“和平饭店”。这个名字的由来颇为平实:源自四年前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区域和平会议。)

例1出自《子夜》,“华懋饭店”这一专有名词被翻译为“Cathay Hotel”,可视为“为求真而直译”(周领顺等,2020)的结果,保持了其作为地理实体和文化标志的身份。然而,这一翻译未关注由文化缺省导致的疏离感,这或许与此建筑在情节推动与强化主题层面的作用较弱相关,且出于对原作的尊重,则在文化阐释和细节补充方面相对克制。相比之下,英语文学则采取了务实翻译。在*Shanghai Grand*中,华懋饭店的翻译被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将其塑造为一个兼具文化底蕴与国际象征意义的场所。正如例2所示,作者通过与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等著名人物相关联,让该建筑再现其昔日风采与传奇魅力。这种做法深化了中国与西方的渊源关系,在英语读者心中搭建起理解中国文化的通道,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与文化传播功能。例3介绍了“华懋饭店”(Cathay Hotel)从建立之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和平饭店”(Peace Hotel)的发展历程,再命名意味着这一殖民时期的产物被赋予了新的社会角色与文化身份,此外,也体现了“和平”二字所承载的新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外宣传中的政治立场与诉求。例2与例3都以严谨翔实的历史信息使华懋饭店背后被遮蔽的意义显化,可见英语文学的作者通过写作和翻译参与历史建构以及讲述中国故事的努力。作者泰拉斯·格雷斯科(Taras Grescoe)在*Shanghai Grand*这部作品的《致谢》中谈到,他曾与专业人士交流并进行了细致调研,和平饭店总经理乔治·韦(George Wee)及其团队带他参观了酒店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工作人员马永章为他提供了和平饭店的历史照片和自20世纪60年代起他在酒店的精彩经历。作者由此获得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体现出对历史真实性与文化背景的高度关切。

通过上述的对比,可以大致认为英译文学更加关注译内效果,而英语文学则关注译外效果,即“在译文上反映为译文(包括一定单位内的创作)靠近社会需求的务实度,在译者行为上反映为译者在翻译外向社会靠近的务实努力”(周领顺,2014:163)。这种差异不仅体现了策略选择上的不同取向,也揭示了不同语境下翻译行为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使命。英语文学对上海形象的呈现显示出更强的传播意识以及跨文化敏感性,塑造出了具有文化杂交特征和全球文化视野的上海形象。

2.2 读者的文本接受

文本只是形象传播中的一个因素,读者也是这个复杂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了实现与读者的情感共振与价值认同,有必要对他塑上海形象的效果进行考察,并在回塑中将西方读者期待作为传播上海形象的重点。鉴于Amazon网站目前每部作品最多只能显示100条评论,因此共收集了来自Amazon和Goodreads的读者评论3471条。经分析,受众对这5

部作品的态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从共通的人性立场解读文本。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了认知转变与情感共鸣,如“与中国人相比,美国对欧洲所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缺乏关注的行为令人尴尬,更不用说种族融合方面的接纳度,这方面中国也领先了我们多年”(Amazon 读者)^①。上海自开埠以后,逐渐成为高度国际化的城市,这片土地为社会名流以及难民都提供了容身之所,这种多元文化共生传统以及海纳百川的品格正是一种世界主义理念的体现。“友好(好客)就是指一个陌生者并不会由于自己来到另一个土地上而受到敌视的那种权利”(康德,2005:24),上海开放的态度以及对他者负责的意识,使乌托邦似的世界主义理想成为了现实。

其次,从中国在二战中作用的角度进行审视。读者谈到,“虽然我接触过不少关于一战和二战小说,但以二战期间中国被日本占领为主题的作品却从未见过”(Goodreads 读者)^②、“我读了很多以 WWII 为背景的小说……绝大多数都以欧洲为背景(德国、英国、法国,偶尔还有西班牙、意大利或欧洲其他地区)”(Goodreads 读者)、“在学校学习期间,除了美国、欧洲和英国以及广岛之外,我几乎没有考虑过战争所影响的其他地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美国中心主义’的教育,……以至于世界其他地方都被忽视了,这本书改变了我的看法”(Goodreads 读者)。经过统计,共有 401 位读者在评论中明确提及对中国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乃至一无所知,其实部分读者的视界也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群体文化心理的一个截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逐渐认识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此关键却又长期被低估,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

作品的评论其实主要侧重于内容、主题、人物塑造以及情感表达等方面,翻译策略方面虽较少被读者直接识别或讨论,但已潜移默化地融入对作品的整体体验中,我们可以间接感知其对于翻译的看法。读者提到,“显然,作者在地点、时间、人物和历史事件等方面经过大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值得肯定……”(Goodreads 读者)、“作者精心研究并浓缩了数百篇个人叙述和游记,让读者得以一睹中国浪漫的风采”(Goodreads 读者)。英语文学的作者在译写时通过对广泛的资料进行研究和筛选,提供了清晰且易于理解的内容,读者对此做法持相对积极的态度。以建筑为例,“一些悠久的建筑,如礼查饭店,依旧回荡着往昔的音乐。这里曾留下众多世界著名领袖的足迹,当你踩在吱吱作响的木地板上,仿佛正漫步于上海丰富的历史长河之中”(Goodreads 读者),正是这种以务实为导向的阐释,在读者心中留下了印记。当然,这些作品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目标读者的需求和期望,但仍有读者认为作品中存在因信息缺失而导致意义模糊的地方,如“我总是停下来用谷歌搜索那些我不认识的地方、人和地点”(Goodreads 读者),这更加说明在翻译中超越文化差异

① 引自 Amazon 网站上的读者评论。(2024-05-28). 参见:<https://www.amazon.com/>.

② 本处及后续相关读者评论均出自读书社区网站 Goodreads。(2024-11-30). <https://www.goodreads.com/>.

并通过适当的深度翻译提升读者阅读体验的必要性。

3 上海形象的回塑与激活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发现,自我表达与他者建构、国外受众需求之间存在落差,需通过回塑进行调解与补充。首先,自塑中的上海形象更多地展现了上海的繁华特质和市井生活,对于上海包容的品格以及厚重的历史展现不够充分。翻译虽保留了原文的核心意义,但缺乏对中国文化中与西方文化关联内容的挖掘。鉴于英语文学始终不是一种中立的交流媒介,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我们更应重视和把握话语权,关注如何通过回塑提升上海的国际表达。

首先,我们应更多地翻译或译写展现上海文化品格的文学作品,利用情感资源弥合文化冲突并降低跨文化沟通过程中的屏障,将上海故事从“个体(局部)文化记忆”,转化为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的“世界性的集体文化记忆”(罗选民,2024)。其实,大部分中国文学都将中国读者的兴趣作为牵引,以贴近中国人内心和体温的故事来映现属于中国的上海文化记忆,更多强调作品的对内功能,忽视了上海中西杂糅、兼收并蓄的形象。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为遥远的陌生人提供了暂居空间,这是我们完善提升上海形象的重要内容,也是有待对外填充与修复的文化记忆,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应更多关注相关历史,以传递一个多维度、包容并蓄的中国形象。同时,还应积极传播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上海人民在4938天中一刻亦没有停止过抗日救亡的斗争”(唐培吉,2015:26),这座城市悲壮而深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被其浮华享乐或堕落放纵所遮蔽,加剧了上海在二战历史叙事中边缘的现状。中国这段时期在世界上未被普遍肯定,与西方刻意无视以及中国自身的沉默不无关系。此外,根据“2022年和2023年美国图书阅读统计”提供的数据,历史小说在美国和全球受欢迎度排名第一,在受访者中分别占41%和34%,加之西方有关二战的文学作品经久不衰,这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切入点。需要注意的是,受制于主流话语体系的认知倾向,对外讲述中国的二战历史始终任重道远,避免操之过急而适得其反。

其次,我们应兼顾非物质文化符号和物质文化符号的翻译,并以“求真为本,务实为用”的原则作为指导(周领顺,2014:87)。对外传播上海形象时,非物质文化符号的翻译具体体现在对故事情节和典籍文化的处理上。译者应保持高度敏感性与伦理意识,对于西方读者鲜见或未知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可在翻译中对文本进行适度的诠释和补充,在文化传真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增殖。同时,对于涉及中西方共同记忆的情节和关键人物的内容,有必要基于史实在翻译中进行深化,发挥好其丰富和辅正历史的作用,并通过共同的文化框架唤起文化共鸣和心理认同,建立起更深层次的理解与对话。非物质文化符号的有效传播离不开物质文化符号的支撑,尤其是构成这座城市独特风景线的建筑。通常想起一座

城市,首先浮现脑海的便是其地标性建筑。外滩建筑群、马勒别墅、拉希尔会堂等历史建筑是西方人在上海留下的烙印之一,与空洞且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景观相比,这些遗产的天然吸引力能够让外国游客从视觉上感知建筑的繁华,在心理上接受城市文化。其实文学早就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来促进旅游,雨果的《巴黎圣母院》(1831)充分体现了文学与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照。这部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汉语和英语分别至少有10个版本,并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音乐剧等,作家的智慧、译者的努力与小说的宣传力量,使巴黎圣母院这一法国标志性景点得以被重新认识并加以保护。因此,涉及景观的翻译时,译者应基于对外宣传的需求以及通过预设读者的消费心理为文本加载更多内涵,如适当补充和延伸建筑背后的文化细节或历史事件,并结合老照片、地图等副文本增强视觉效果,为文学话语的阐说扩容,促使读者从良好的文本体验过渡到进一步参观阅读到的景观,实现其旅游价值。总之,“讲好中国文学故事,与其说是‘求真’行为,不如说是与目标相结合的社会化‘务实’行为”(周领顺,2024),译者有责任使文学作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发挥影响力,进而使其成为有效的文化外交工具。

4 结语

从以我为主的传播思路转向跨文化互动,有助于获得自塑困境的解决之道。上海形象是我们对外言说中国形象的重要部分,在与他塑的互识互参中可以看到自塑在国际叙事体系中的不足。其实,上海不缺有生命力的鲜活素材,为了弥补文学翻译中上海形象对外传播的断层,在既有传播积淀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丰富和深化传播内容,展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包容性、多样性以及历史底蕴,提升中国话语的穿透力与辐射力。同时,注重翻译的务实度,缩短文化距离,增强西方读者的理解和文化共鸣,使建构的上海形象更好地被认同与接纳。

参考文献:

- Bernstein, L. 2020. Wang Anyi's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Memories of Shanghai as Commentary on Modern Society[G] // L. Bernstein & C. Cheng. *Revealing/reveiling Shanghai: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from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ies*. New York: SUNY Press.
- Beller, M. 2007. Perception, Image, Imagology[G] // M. Beller & J. Leersse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 Caldwell, B. 2001. *The Distant Land of My Father*[M]. San Francisco: Chronicles Books.
- Field A. D. 2014. *Mu Shiyong: China's Lost Modernist*[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i, N. 2010. Preserving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The Chinese Context[J]. *The Public Historian* (4): 51-61.
- Mones, N. 2014. *Night in Shanghai*[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Ng, K. 2020.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Long Novel: Mao Dun's *Ziye* 子夜 (Midnight) and Representational Problems between Fiction, Locality, and Modernity[J]. *Prism: Theory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2): 326-352.
- Huang, N. 2009. Chang, Eileen (ZhangAingling) [G] // D. Pong. *Encyclopedia of Modern China Vol 1*. Farmington Hills,

- MI; Charles Scribner's Sons/Gale Cengage Learning.
- Randel, W. D. 2021. *The Last Rose of Shanghai* [M]. Seattle: Lake Union Publishing.
- Scott, M. & C. Tribble. 2006. *Textual Patterns: Key Words and Corpus Analysis in Language Education* [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tevens, S. E. 2003. Figuring Modernity: The New Woman and the Modern Girl in Republican China [J]. *NWSA Journal* (3): 82-103.
- 陈超南, 刘天华, 姚全兴. 2008. 都市审美与上海形象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陈晓兰. 2005. 原始与现代: 上海的双重面貌——20世纪早期中西作家对上海的不同想象 [J]. *中国比较文学* (1): 109-120.
- 冯雪静. 2007. 三个老上海: 海派代表作家与西方作家小说中的老上海形象解读 [D]. 兰州: 兰州大学.
- 凤羽, 冯庆华. 2022. 隐喻翻译与上海城市形象的跨文化建构 [J]. *上海翻译* (2): 84-89.
- 耿强. 2009. 全球化与翻译策略: 异化·归化·航入 [J]. *东方丛刊* (4): 115-127.
- 管文虎. 2000. 国家形象论 [M].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李圣杰. 2023. 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 概念接受、学科定位及理论建构 [J]. *社会科学家* (10): 10-16.
- 梁昕照. 2010. 跨文化视野下的上海形象 [D].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 刘晓峰. 2023. 无本译写: 一个亟待开发的翻译研究领域 [J]. *外语教学* (5): 88-93.
- 罗选民. 2024. 大翻译与文化记忆: 融合与启示 [J]. *外国语文* (1): 1-8.
- 念蕾. 2023. 《长恨歌》英译本中上海城市形象重构研究 [D]. 重庆: 四川外国语大学.
- 覃江华. 2011. 语言钢琴师——美国汉学家金凯筠的翻译观 [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21-125.
- 唐培吉. 2015. 上海抗日战争史通论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惠中. 2002. 语料库语言学导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叶梓. 2022. 被强化的上海形象——基于形象学的《长恨歌》英译本研究 [D]. 厦门: 厦门大学.
- 伊曼努尔·康德. 2005. 永久和平论 [M]. 何兆武,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于蕾. 2011. 后殖民视野下文学文本中的上海形象 [D]. 济南: 济南大学.
- 钟浴曦. 2013. 上海“国际大都市”文化构建及其“世界主义”内涵 [J]. *理论观察* (3): 28-31.
- 周领顺. 2014. 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 任俊. 2020. 译出态度与译者行为——以本土译者汉语乡土语言译出实践为例 [J]. *山东外语教学* (4): 102-109.
- 周领顺. 2024. 译者行为互动关系分析 [J]. *外语研究* (3): 1-5+112.
- 朱向前, 傅逸尘. 2015. 一篇读罢头飞雪——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综述 [J]. *当代作家评论* (4): 4-13.
- 朱振武. 2020. 汉学家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研究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 [J]. *外语教学* (5): 81-87.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Shanghai's Image Building: A Study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Representation and Other-Representation

DONG Xiu GUO Yanran

Abstract: China's global image is built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multiple actors and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between self-representation and other-representation, with literary works serving as a key mediu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hanghai's portrayal in translate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n English literature reveals certain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auto-image and hetero-image. On one hand, from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self-representation hasn't fully captured the warmth and richness of the city; aspects like Shanghai's cultural traits of inclusivity and resilience still need to be foregrounded through careful material selection and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from a translational perspective, for Western-intertwined symbols and even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utility-attaining approach is need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i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other-represent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dimensions outlined above can be reinforced to better shape Shanghai's image. This will help to refine China's narrative system and contribute to a more multifaceted national image abroad.

Key words: Shanghai's image; literary translation; self-representation; other-representation; reflective re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陈宁